

从研究中外

刘东主编



中国食物

THE FOOD OF CHINA

[美]尤金·N·安德森著
刘东译
马嫂审校

江苏人民出版社

刘东 主编
周文彬 总策划



THE FOOD OF CHINA

中国食物

[美]尤金·N·安德森著
马 嫣 刘 东 译
刘 东 审校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食物/(美)安德森著;马嫂、刘东译;刘东审校.一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7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刘东主编)

ISBN 7-214-03173-6

I. 中... II. ①安... ②马... ③刘... 龙... III. 饮食—文化—中国

IV. TS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9899 号

The Food of China

Copyright © 1988 by Yale University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3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书名 中国食物
著者 尤金·N·安德森
译者 马嫂 刘东
审校 刘东
责任编辑 汪意云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销商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排 江苏苏中印刷厂
印刷者 丹阳教育印刷厂
开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张 9.625 插页 2
字数 300 千字
版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173-6/G·1054
定价 20.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谨以本书献给世界上饥饿的人们，希望中国供养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经验能被更广泛地借鉴。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呀的是，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东
1988年秋于北京西八间房

在一个饥饿随处可见的世界里，中国设法在可耕地相对很小的面积上养活了 $1/4$ 的人口。这一成就，除了归因于行之有效的社会主义政府外，还归因于中国的农业体系，不仅高产，而且——至少原则上——是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农业大量依靠高产农作物品种、养分的反复循环、水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由数千万农民耕作者高度熟练的集约劳动，而不太依靠机器和化学品。既然现代工农业的变化归咎于能源成本的上升与水土污染规模的扩大，中国的选择就变得更有吸引力。人类的未来可能要依靠中国式集约农业与“高技术”时代的结合。

因此，几年前我开始研究农业在传统中国的发展。我的希望是现代的政府和个人将向中国人学到如何促进发展的一些教训。

我从看似合理的假设开始，即中国为养活不断增加的人口而形成了农业体系。为了养活不断增加的众多人口，中国逐步发展其农业体系。然而，我发现很多关键的发明是在中国人口庞大和密集以前就产生了。的确，现在的情况看来是，人口的高度密集使中国比其已知的人口较少的时代更加集约化、却又更少有发明（赵冈，1986 年；伊懋可，1973 年）。这不是否认人口压力对中国农业的重要意义——或者更准确地说——食物的高效要求对中国农业的重要意义。然而，对食物的需要可以在几方面得到满足，例如，通过扩张和征服，通过外迁，通过过分依靠一种主要农作物（如同大饥荒以前的爱尔兰），或通过杀婴。所有这些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都曾尝试过。然而，中国的基本解决办法是发展精耕细作的、高度多样化的、可持续的农业。为什么作出这种选择呢？

中国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允许甚至鼓励耕作体系的多元化。较高水平的贸易（甚至在史前时代）促使高度“理性化”的市场体系在文明开始后不久就出现了。这又促使政府关注食物的获取——不仅为了平民，还为了军事保

障。军队必须有补给;被围困的城市必须有食物供应。于是,到中国的帝国时代渐露端倪之时,充分发展的农业政策已经存在了,而且政府还承诺给予农业以极大的优先权。这项政策成功了。在农业生产率方面,直到相对现代以前,中国远远走在任何其他文明之前。

中国人讲究食物、烹调法和精心安排进餐,则有另外的根源。围绕着对名誉和地位的承认,礼仪和礼节将社会准则制度化了。对老人和精英人物的尊重要用宴会来表达。神,作为社会共同体的“集体代表”,也坚持要最好的东西;他们品尝献祭食物中无形的精髓,而人类社会则分享有形部分。此外,中国很早就发展了医学,营养在其中起最重要的作用。很多食物被食用,很多农作物被栽培,只不过是因为它们的药用价值及营养价值(真实的或假托的)。

这些信仰体系导致了对食物生产体系的要求。就连穷人也想要美食,至少为了新年和其年迈父母的生日。就连健康人也想要通过喝豆浆、吃有生姜的鸡或海参,来使自己青春永驻。因而,具有营养价值的小宗农作物也得以栽培。

帝国时代的中国显示了下述悖论:高度进化的食物生产体系与饥饿的百姓并存。这部分地归因于对子孙满堂的看重——儿子们是一个人年老时的惟一保证,还归因于掌权者企图从百姓那里榨取所能榨取的任何东西,往往把他们逼到生存线以下。食物体系继续强化,因为农民要努力生存下去。

简单的决定论不能解释中国的食物体系。它是人类选择的产物,即皇帝和农民、商人和主妇、医生和渔夫无数决定的产物。

在本书中,我提出了对中国食物的一般看法,讨论了在解释它如何演变为今天这种状况时所碰到的一些问题。很多问题依然存在。例如关于传统时代的产量问题,我们知道得仍旧很少,最近由温大中(音译)和皮门特尔所写的著述(1986a, 1986b)就指出,产量甚至比我们所想的还要高。如果这些学者是正确的话,中国的食物体系就远比我们认识到的更有效。我们需要更多地知道人口统计的情况;施坚雅最近的著述(1986 年)提出,中国古代人口普查数字可能完全被夸大了。我们也需要更多地了解帝国时代中国租税和土地所有权以及它们怎样影响生产的情况。我们需要更多地知道整个体系起源的情况(古德炜,1983 年)。我们必须弄清来自西亚的影响,了解医学、美学和享乐主义以及实际存在的区域性差异。但我自信中国食物史的主要轮廓现已明朗。

本书并非对中国食物作全面考察:没有理由去重复由白馥兰(1984 年)、张光直(1977b)、比利·温奇·扬(1984 年)和别人提供的对过去事件的精彩

描述,或者雅克·梅(1961年)、R.O.怀特(1972年、1974年)和伊丽莎白·克罗尔(1983年)所作的那些当代营养学之类的考察。我不打算考察自现代工业社会波及中国以后农业方面的变迁:那将需要比本书更长的另一本书。我关注的全然是传统体系,因此我将其现代变迁留给更有资格论述的人。我的著作不包括综合性书目;我只引用容易得到的资料,用来说明本书的特定论点。尤其是不论得失与否,我几乎没有提到中国的文学作品(部分是由于图书馆里不易得到)。我目前正继续从事研究,在一些方向上延伸到了这一计划。本书只是一个驿站。

鸣 谢

Xiii

本书的问世归功于几块大陆上数以百计的人们。我借此机会深谢所有未在这里提及姓名的人。我没有忘记你们！只是篇幅不许可我一一历数。

对我的前妻及合作者玛丽亚·L·安德森和我的三个孩子劳拉、艾伦与塔马尔，我所欠太多。他们经历了多年的实地调查，并与我一起享用了数千餐令人惊奇的膳食。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玛丽亚的协助、经验和思想。

在帮助我研究的很多人里，我特别牢记着乔国泰（音译）及其一家、塞西莉亚·乔·劳、王春华（音译）、陈腾梁（音译）、郭伟德（音译）、约翰·何，以及阿利·宾·埃萨。我对他们和其余很多人深表谢忱。

我也欠我老师们的情，特别是布伦特·伯林、彼得·布德伯格、尼克·科尔比、沃尔弗勒姆·埃伯哈德、道格拉斯·奥利弗和爱德华·谢弗。

在帮助和支持过我研究的同事及朋友里，我热爱和感谢我的父母、戴维·艾克斯-琼斯、斯坦利和安妮·贝德林顿、白馥兰、保罗和萨利·比尔、陈启云（音译）、艾伦·菲克斯、希尔·盖茨、切斯特·戈尔曼、菲利普·黄、朱迪特·卡托娜-阿普特（尤其感谢她催促我采取行动解释中国的食物方式）、迈克尔·卡尼、卡罗尔·拉德曼、维克托·利皮特、罗伯特和凯瑟琳·马丁、苏切塔·梅扎姆达尔、詹姆斯和海伦·麦高夫、卡罗尔·纳金加斯特、杰奎琳·纽曼、马乔里·托普利、巴拉拉·沃德、克里斯廷·威尔逊、比利·温奇·扬，以及其他许多人。

也感谢埃伦·格雷厄姆和斯蒂芬妮·琼斯富于同情的校订，并永远感谢乔伊·塞奇和许多打字员与助手处理我不规范的手稿。

这项研究得到了加利福尼亚大学、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和国家科学基金，以及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基金。我的希望是，本书在我们走向更好的世界食物体系时将提供帮助，并藉此部分地报答纳税人，他们是我的最终赞助人。

年 表

XV

- (约)公元前 6500—6000 年 已知最早的中国农业:北方的粟
- (约)公元前 5000 年 最早的稻:长江三角洲的河姆渡
- 公元前 4000 年 农耕广泛传播和完全确立;若干植物和动物种类
- 公元前 3000 年 农业在中国易于耕作的地区普及;社会分化;大的村落常有防卫布置;走向文明
- 公元前 2000 年 华北和满洲的文明社会;夏朝大致开始
- 到公元前 1500 年 商朝(传统说法是始于约公元前 1751 年;实际则大约始于公元前 1600—1500 年)
- 到公元前 1028 年 周朝(传统说法是始于公元前 1122 年,现在提出的一系列日期都较晚)
- 公元前 480 年 周朝分裂成战国
- 公元前 221 年 秦统一中国,创立了中华帝国
- 公元前 207 年 秦亡
- 公元前 206 年 汉朝赢得统治
- 公元前 179—87 年 中华帝国农业政策形成(文帝、景帝和武帝)
- 公元 220 年 汉亡
- 公元 220—265 年 三国时期
- 公元 265—420 年 晋朝(中国未真正统一)
- 公元 420—589 年 六朝
- 公元 581—618 年 隋朝;中国重新统一
- 公元 618—907 年 唐朝;壮观和繁荣的贸易,特别是与中亚和西亚
- 公元 907—960 年 五代;中国分裂,军阀割据(实际上大大超过五个分裂王朝)
- 公元 960—1279 年 宋朝

2 中国食物

公元 937—1125 年 辽朝；属于阿尔泰语系的统治者占领了中国北方的一些地方

- XVI 公元 1125 年 金朝(讲通古斯语的统治者)征服辽朝
公元 1126 年 金朝征服宋朝, 占领了中国北方全境; 宋朝在南方残存
公元 1234 年 蒙古人征服金朝, 占领中国北方
公元 1279 年 元朝; 蒙古人征服宋朝, 控制了全中国
公元 1368 年 元亡, 明朝兴起
公元 1368—1644 年 明朝
公元 1644—1911 年 清朝(入关)

目 录

序 /1
鸣谢 /4
年表 /5
第一章 自然环境 /1
第二章 史前史与历史的发端 /7
第三章 至关重要的一千年:周朝到汉朝 /23
第四章 来自西方的食物:中世纪的中国 /45
第五章 食物体系的确立:宋朝以及诸征服王朝 /54
第六章 内卷化:中华帝国的晚期 /73
第七章 传统农业的顶峰 /97
第八章 今日中国食品 /108
第九章 一些基本烹调法 /144
第十章 区域和地方 /154
第十一章 食物的传统药用价值 /182
第十二章 食物在社会中 /194
附录:隔壁邻居家的主餐 /208
注释 /214
书目 /221
附篇一 中国文化中的饮食——人类学与历史学的透视 张光直 /249
附篇二 中国思想与中国文化中的食物 弗雷德里克·J·西蒙 /264

第一章 自然环境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富戏剧性的自然景观之一,其变动范围从世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也称埃佛勒斯峰,通常标高 29,141 英尺)到最低的地表凹地之一(吐鲁番盆地,低于海平面约 900 英尺),从南方的热带雨林至喜马拉雅高山上的冰河期冰帽。这种跨度无他国能及。中国得天独厚的动植物种类也同样蔚为壮观。中国西南部山区拥有不同于地球上任何一个温带地区的最高级植物。东南亚诸森林——北延至中国,尽管并未在这里显示出其最大的丰富性——就更多种多样了;只有南美洲热带地区才拥有远为不同的植物。当冰河在更新世向南侵袭时,北美洲与欧洲的森林被迫退到加勒比海和地中海,而亚洲与北美洲西部的森林则被赶入荒凉的山区。惟独在中国,它们才找到了一条宽阔的走廊,得以在此栖身至气候好转;而且就连中国北方的许多有利地区也保持了相对的温暖。于是,在世界其余地方曾一度广泛分布的大部分植物,如今仅在中国生存:这类植物包括银杏和水杉。此外,中国的多山地形也导致了地理上的差异,有助于物种的形成。气候变化及其后果造成了植被反复迁徙与断裂的复杂历史,赋予中国丰厚的植物遗产。在有人烟的温带,任何别的地方都没有这样一系列可供利用的潜在食物。中国人极少失去对新食物的兴趣,而且他们的位置处于东南亚丰富的珍稀植物与近东古代农业发源地之间,也属世界上借用模仿的最佳位置[有关中国地理的全面叙述,见布坎南,1970 年;布坎南、菲茨杰拉德与罗南,1981 年;T. R. 特里吉尔,1980 年;段义夫(音译),1969 年]。

与地道的北极和赤道气候相区别,中国同时也缺少对大农业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种气候类型,即地中海气候。农业虽然最早在地中海地区出现,但世界上很多早期主要食用作物却从未在中国有过重要地位。中国地处亚洲的东海岸和内陆,大部分雨水由太平洋往东北刮来的夏季季风带来。地处中亚的中国最西部地区,季风难以到达,降雨量逐渐减少,雨水大体在冬天降临。²

而中国的其余地区则完全是夏季降雨，别的季节雨水在较潮湿的区域虽然也很可观，但总雨量中只有一小部分出现于较凉爽的半年内。

中国有五大区域：

华北(North China)，包括旱地耕作区在内，这是中国文明的心脏地带：黄河平原及其周围的丘陵。

东北(满洲)(Northeast China)，这是一个有亚极带森林、冬季寒冷的地区，但也是一个有丰饶河谷的地区。

中亚的中国部分(Central Asian China)，是内蒙古、新疆及邻近地区的沙漠和半沙漠，干旱少雨，不能进行灌溉农业，代之以牧民放牧或在绿洲集约灌溉。

华南(South China)，从秦岭山脉及其连接部(在长江流域的北侧)逶迤向南，包括长江和多丘陵、多山地区，稻米是这里的主食。

西藏(Tibet)，从广义地理学的角度(除西藏自治区外，还包括青海省大部、四川和云南的小块地方)，它指中国西南部辽阔荒凉的高原及山脉。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地方寒冷干旱，以至于完全不适合居住。

华北，在考古和历史方面是中国最著名的地区，也是中国文化的摇篮所在，包括最早的农业遗址。这里是少雨地区，差不多全在气候温暖的半年内降雨。冬天寒风凛冽，干旱多尘。华北的中心是广阔的黄河冲积平原，黄河蜿蜒流过，被称作“中国之忧”，由于取道沙漠与半干旱地区，所以这条长河挟带的泥沙太多而水量太少。黄河经常改道，每每是由于人为的活动：堤岸被垫高，河床淤积至高出地面，要不就是由于洪水或者频繁的蓄意军事行动摧毁堤岸。由此产生的大水不仅冲毁耕地，还在下游流域里造成大片盐碱地，直到现在才加以改造(有些位于被部分隔离的海湾，因此盐碱格外严重)。在这块大平原周围，先前显然存在着高高的、崎岖不平的丘陵。这些丘陵通常都覆有一层薄土，但在西北即甘肃、陕西、山西及接壤地区，却被黄土——由风带来的广袤沙土沉积物所掩盖。这种黄土大多在更新世的寒冷干旱时期从蒙古干草原刮来，当时这片丘陵甚至比今日还要荒凉。被风吹来的尘土仍在继续大量飘移。这种黄土很厚(在一些地方达数百英尺)，非常肥沃，而且蓄水性强。黄土地受垂直冲刷而易于侵蚀，所以其特征为陡峭的沟壑、平坦的斜坡与山谷，这是形成梯田的基础，梯田现已成为这一地区的主要景观。黄土及其衍生的冲积层呈淡黄色，黄河因此得名，黄色也成为中国文献中的重要色彩。“天玄地黄”，中国王朝统治时期普通学校的启蒙课本就从这一句开始；褐色在过去或现在都被看成是深浅不同的黄色，而非一种单独的颜色。

华北的绝大多数人住在冲积平原及其周围的丘陵、特别是西北的黄土高

原和山东的多石丘陵。西部高地有较为高大的山岳以及起伏不平的干旱地区。大山和丘陵曾经长满树木，但无人知晓黄土地上的森林有多大范围；对此的估计从几乎完整的森林到几乎完整的干草原都有。前一种推测让人难以置信，因为该地区干旱、容易着火，在气候与地理方面其实非常近似于美国中部大草原和平原，那里的树木沿小溪边长大成林，并散布在岩石较多的较高山地。这种情形在中国肯定也是同样的。早期的历史记载告诉我们，冲积平原曾被喜水树木组成的河畔大森林、沼泽与湿地覆盖。但我们仍旧不知道范围有多大。华北现在没有一平方英寸的天然植被；大部分土地处于集约耕作之下，除了一些杂草外，再没有“野生”植物。天然森林在几个世纪以前就被砍光，而树木只是在寺庙和神殿周围或作为防风林和种植园才生存下来，因此要重现过去的植被很困难。分析古代花粉将为此提供一个立足点。

华北是中国许多基本食用作物的原产地，包括粟、大豆、白菜（还有油菜籽）和桃在内。这些作物仍在以野生或像杂草般蔓生的形式繁衍着。绵羊是当地产的，并且可能就在这里被驯化，与它们在近东的早期驯养没有关系。然而在今日华北的农业中，引进的植物包括小麦、玉米、高粱、稻子、棉花和芝麻，已占据了支配地位。

直到近代以前，东北主要还是由说通古斯语的民族及其他非汉民族所居住。它大部分是山区，林中长着云杉、冷杉、白桦、落叶松、松树以及别的耐寒树木。中部由河网交织的广阔平原、草地与沼泽组成。如今这些都已被开垦，玉米和高粱属于主要农作物；它们可与马尼托巴及达科塔的平原相比拟。在中国的大部分历史中，东北是一个边缘地区。

中亚的中国部分，包括由于太干旱而不适于主要依赖雨水浇灌农业的地区（在新疆西北部和内蒙古有很少一点依赖降雨的农业）。这里的土地主要是沙漠或干旱的草原，与一望无际的牧草、寸草不长的戈壁相映衬。山中的森林只出现在气候适宜的地带，诸如新疆北部的中央高地这类地方。世界上最干旱、最荒凉的一些地区，经查明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那里实际上终年无雨。大河水源来自新疆沙漠盆地四周的群山中，黄河也流经该区域的一些地方：这里实施集约化的灌溉农业。然而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动荡的局势导致了这种农业的崩溃。中亚的中国部分（以及现在属于蒙古与苏联的毗邻地区），是蒙古族、突厥语族以及其他民族的大本营，游牧民扬鞭策马，四处征战，曾占领了中国的全部或部分，但最终都放弃并撤走，或者被汉人同化。这些民族现在仍然人口众多，在该区域各大城市的外围大部分地区及东南部的主要农业区形成了多数。伟大的丝绸之路穿越中亚，从兰州和玉门经由塔里木盆地（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向北或向南），随后翻过高山到达费

尔干纳、撒马尔罕，接着向西延伸（布尔诺伊斯，1963 年；谢弗，1963 年）。这条路，与别的平行或汇合的路线一起，在中国大部分的历史中，构成了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的主要通道。与南方的贸易从来不是很重要。与印度的往来大多取道阿富汗，并在巴尔赫附近并入丝绸之路。直到最近几个世纪之前，海路一直没有陆路重要。好几千年来——自史前时代初起——中国所受的外部影响主要通过这块散布绿洲的广袤干旱之地传入，或者通过更偏北的西伯利亚干草原和森林—干草原传入。中亚充当了一个庞大的过滤器：只有能顺利通过沙漠之路及干草原的事物，才有希望进入“中央之国”。

华南现在是该国绝大部分人口的家园，食物生产所占百分比甚至更大。这里的地形是，不平整的丘陵高地与冲积成的河谷相间，其中最大的冲积河谷是江淮平原（西江流域及其更南端的支流远远落在第二位）。在高原，如云贵高原，多丘陵的盆地，最重要的是温暖多雾的四川红色盆地，也都是重要的食物生产基地。惟有红色盆地向作为食物生产中心的沿江与沿海平原发起挑战。该区域夏季高温多雨、降水量总是充沛，而在西部山区则嫌过多——华南的西南部离印度东部与缅甸西部的丘陵这些地球上雨水最多的地区不远。该区域的天然植被大多是常青树或亚热带雨林。完整的热带森林出现在更南面，而令人难以置信的茂密森林出现在西部。与华北相比，华南仍有大量森林地带。虽然它们大多已退化，并遭到乱砍滥伐，但重新植树造林及恢复原貌的工作现正在进行之中。土壤属于温暖、潮湿、林木覆盖地区的那类，亦即通气透水性强的红色与黄色酸性土壤，水从中汲取到大部分养料，以及肥沃的冲积河谷土壤，其中的养分被反复沉淀。在少数富含母岩的地区，特别是红色盆地，丘陵的土壤不太贫瘠，但大体而言，河谷要比丘陵更丰饶，而且最近几世纪中越发如此，因为农耕与砍伐森林造成了斜坡的侵蚀。于是人们就集中到冲积地上来了。

5 华南是产稻大区。而在陡峭的山坡以及其他不适于种稻的地区，则栽培玉米和块根作物。地势最高的地区生产小麦和大麦，在这一区域较为凉爽的地方——尤其是江淮平原，这两种作物也与稻子交替轮种。小麦和大麦在冬季栽培，到春季成熟；然后再栽种稻谷。降雨规则利于稻麦轮作——冬干夏湿，适用农作物的各自需要。再往南去，稻子一年两熟，而在更偏东南的地方甚至一年三熟。华南也有足可引以为豪的多种多样小宗作物以及格外有效的耕作管理制度，后者建立在有水栽培基础之上，不仅有水稻，还有从水芹到塘鱼的其他水生产品。

西藏是一个辽阔的高原，地球上人迹罕至的最高山脉是其屏障并环绕四周。该高原大部分地区在海拔 16,000 英尺以上。整个高原又高又冷，而且大

多数地区都高得不适合农业生产，并完全不宜居住。地势较低、气候较暖的南部与东部生产大麦、荞麦、萝卜、洋葱和别的一些作物——在最东南端甚至还生产一些稻米，这些地区的大部分居民以农业为生。大多数不宜耕作的土地则由牧民流动放牧绵羊、牦牛以及别的牲畜。西藏本地品种的牦牛是一种特别的赐福；若没有它，西藏有人烟的地方大半将不适合居住，或者近乎这样。牦牛提供奶、肉及劳力。即使如此，中国的整个西藏高原地区也只有数百万居民——比低地的一些单个城市的居民还少（埃克瓦尔，1968年；斯内尔格罗夫与理查森，1968年；塔西，1967年）。

因此从整体观之，中国是由华北和华南那些居民众多、农业发达的富裕地区组成，而人烟稀少的荒野地带则环绕四周，后者直到不久前还主要由非汉人口居住。自汉朝以后，讲汉语者把自己叫做“汉人”。在中国还查明有50多种其他语言；说这些语言的人都不是汉人（此外尚有说汉语的穆斯林，通常叫做回民而不是汉人）。非汉族包括回民在内，主要居住在东北、中亚和西藏地区，以及南方的热带及亚热带山区。人口密集地区包括在中国传统的18个省份之内；边缘地带组成了9个以上的省（加上台湾）。在中国大部分历史中，只有这18个省和中亚的中国部分赫赫留名，但即使在它们中间，也还有很多边缘地区。的确，在中国的大部分历史中，最西南面的3个省，云南、贵州和广西，比西藏和中亚更为生疏，更不出名。因此，人口稠密、长期稳定的18个省与中国的其他地区，长期形成鲜明的对照。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是一个灾难之地（可靠叙述见马洛里，1926年）。华南在这方面得天独厚，对它影响最大的也无非是水灾和沿海台风，而支撑它的水稻体系却非凡地稳定高产。华南很少发生大饥荒，除非由战争和政治动乱（它们频频发生，一点不假）所致。中国其余地区则饱受干旱、洪涝、地震和其他灾难的困扰，食品生产受破坏，经济遭瓦解。世界上最可怕的自然灾害都发生在中国：明代陕西地震死亡830,000人；1976年唐山地震伤亡人数大概有600,000人；华北地区的饥荒实际上年年都有记载，可以说水旱频仍；东北和中亚的严冬经常将牧民的畜群全部冻死。中国的灾变主要由于两个因素。首先是季风。如果雨水比通常向北扩展，并且很大，洪涝就会出现；如果推进得不够远或来得太稀少，干旱就会使土地歉收。其次是来自印度次大陆的持续不断的压力。受地壳运动的影响，印度次大陆被不由自主地向北拖曳，并被塞在亚洲大岩层下面。结果使得喜马拉雅山表面奇形怪状，地面在这里褶皱密布，就像一块被推向墙根的毛毯；其后是高原与山区；中亚巨大的断层、裂缝和峡谷向东延伸到华北，当印度和这一北至西伯利亚的坚硬多山的古老地块之间的地表受到挤压翘起裂开时，就发生地震。另